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地位

——访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李忠杰

本刊记者 安平

一、宣言书和新阶段

记者: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10周年。我们想围绕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地位这个问题,请您谈谈看法。

李忠杰: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现在,10个年头过去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成就,南方谈话的意义日益深刻地显露出来,我们对于南方谈话的历史地位也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记者:南方谈话的历史地位表现在哪里呢?

李忠杰:党中央的有关文献作过一些规范的表述。1992年3月,就在邓小平刚刚发表南方谈话之后,江泽民同志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表示完全赞同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认为谈话不仅对中国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中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指出:“今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十四大重申了政治局会议对于南方谈话的评价,同时进一步指出:“以邓小平同志的谈话和今年三月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97年

2月,在邓小平去世时,《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江泽民同志《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则改为“以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

1997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上的报告,从论述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的角度,将南方谈话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并提为关键时刻的两个宣言书:“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概括起来,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地位主要就是两句话。一句:它是在历史关键时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另一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这两句话各有侧重,但内容是统一的。正因为它起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巨大作用,所以,推动和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改革大潮的周期性过程

记者:那么,为什么说南方谈话以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南方谈话本身又为什么能成为这样一个标志呢?

李忠杰:10年来的事实已经充分表明,以南方谈话为标志,我国的改革更

加深化,开放的水平更加提高,现代化建设的步子更快更稳,取得的成就十分显著。与南方谈话前相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确实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当然,认识这个问题还不能仅仅列举10年来的一些事实材料。任何事物的出现、任何事件的发生,其社会影响和历史地位如何,归根结底,都要放到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从其内在的逻辑即规律的角度来分析,深入地探寻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在作一种什么样的过程性运动,当它到达某个特定阶段时,遇到了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南方谈话又在哪个层次哪种意义上解决了这些问题。也就是说,只有充分认识改革开放的逻辑过程,我们才能更加清楚地认识南方谈话在这个过程中所起到的推动和标志性作用。

记者: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角度。能否请您展开来谈一谈呢?

李忠杰:要谈这个问题,首先要把握视野放宽一点,从整个社会主义改革的进程来挖掘其内在的规律。

回顾我国以及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社会主义改革,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一个周期性发展的运动过程。在10多年前,我就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先后经历过三次大的浪潮,实际上也就是经过了三个发展周期。至于现在,可以说正处在第四次浪潮和第四个周期中。

马克思说过:“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

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社会主义改革的周期性,正是由制约着改革的诸种内外条件所决定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改革运动只能提出、也只能解决业已成熟,能够完成的任务。一旦超出历史条件的许可,试图解决那些尚未成熟、难以解决的问题,那么,改革就必然会遇到重重障碍,出现低潮甚至危机。只有等新的条件成熟了,改革才能在新的层次上继续展开。所以,改革的周期性并不是人为追求的,而是客观的历史条件造成的。

纵观社会主义改革史,它的前三个周期或三个阶段,连同现在进行中的第四个周期和阶段,构成了一个逐次递进的序列。改革由一国到多国、由局部到整体、由表层到深层逐步发展、逐步推进、逐步深化。在每一个周期或阶段,改革所处的环境、条件,以及相应地所提出的任务、所解决的问题,是并不完全相同的。

第一个周期或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前期,是着重解决旧体制造成的最紧迫、最突出的问题。如个人崇拜、冤假错案、农轻重比例失调、条块关系等等。当时人们对体制本身还缺乏足够的剖析和认识,不可能自觉地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改革。改革是作为消除危机的紧急措施开始的,没有真正触及社会主义体制的运行机制及其整个结构问题,步骤、方法、措施也不够稳妥。所以,当现实的紧迫问题初步解决,但又莽撞地试图冲击旧体制时,便不可避免地遇到体制上、思想上、干部队伍上的重重障碍,并终于受到旧体制的顽强反弹。改革本身,除个别国家外,大都遇到了挫折,甚至被迫中止。

第二个周期或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是深入到旧体制内部,对该体制的运行机制进行调整改造,试图完善这一机制。在这个周期,许多国家对传统体制的弊病有了更多的认识,也吸取了前一阶段仓促上阵、考虑不周、遭致混乱的教训,因而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制定了比较全面的方案。改革围绕着完善现有体制的机制而展开,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领域,也涉及政治体制,所采取的措施

具有综合配套的特点。因而,对传统模式的改造向纵深发展,改革的成效一度也比较明显。但是,这个阶段的改革还没有从根本上突破传统体制的基本框架。当进到一定深度时,便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和现实条件的制约,难以有新的更大突破。加上世界经济形势和国际政治现象发生变化,改革的外部环境恶化。于是,各个国家的改革都遇到困难,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减缓。在尚未找到新的出路以前,不得不采取收缩、调整的措施。改革的高潮回落,人们开始思索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新的社会主义体制模式的问题。

第三个周期或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末,不同于或高于前两个周期的是,大多数国家都对传统模式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改革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为增强。因而,已经不满足于对传统的模式进行修补和完善,而是要对旧体制进行全面的根本性改造,实现新旧体制的根本转换。经过艰苦的探索和实践,大多数国家已经打破了旧的体制。但是,随着“破”而来的必然是“立”的问题。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新体制来取代旧体制?新体制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机制上?怎样依靠新体制来解决现实的经济社会问题?以什么样的战略实现新旧体制的过渡?到80年代中后期,这些问题已非常现实地摆在各国政府面前。

记者:当时许多国家改革的势头很猛,但好像也比较混乱。

李忠杰:是的。当时各个国家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有的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大胆的设想,有的在实践中初步建立了一些不同于过去的新制度。但是总的来说,远没有出现一个非常清晰、完整、科学、现实的蓝图,远没有对上述问题作出非常系统、科学的回答。

这就是说,出口打开了,但理想的模式还没有找到。改革到了历史性的十字路口,未来向何处去?改革向何处去?人们迫切需要得到回答,但现实又很难立即作出回答。比较普遍的难题有:所有制结构问题以及相应的产权形式问题,价格体系及其改革问题,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率问题,如何对待政治

多元化问题,政权结构及其合法性基础问题,社会利益关系及其调节机制问题,社会意识形态的调节与控制问题,等等。

面对着这些复杂的问题,各国的党和人民依据本国的国情和自己的认识,进行艰苦的探索,并不断作出相应的选择。由于这些问题本身的难度,加上各自背景、条件和认识水平的差异,不同的人们作出的回答大不相同,甚至迥然相异。议论纷纭,莫衷一是。从1988年起,各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困难迅速增加,社会矛盾和党内分歧进一步加剧。社会主义改革不仅出现效益递减现象,而且出现了复杂、动荡的局面。某些国家已陆续出现社会动乱的迹象和事件。

记者:人们是怎样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的?

李忠杰: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中,主要有三种不同的选择和倾向,相应地,社会也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派别和政治势力。

第一种,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既反对固守斯大林时代的旧模式、旧观念,始终坚持改革的方针,又反对抛弃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倒向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

第二种,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主张全面引进西方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崇拜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向资本主义蜕变。

第三种,固守斯大林时代的旧体制、旧观念,把早已证明是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教条仍奉为原则,思想僵化保守,不同程度地反对改革,一有机会就希望退回去。

这三种政治倾向和政治势力处于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及其力量对比,左右着改革的方向。而其较量的结果,则从根本上决定着改革的命运,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命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和过程中,发生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三、南方谈话的重要历史意义和历史地位

记者:您分析的这种历史过程与邓



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地位有什么关系呢?

李忠杰:按党中央的说法,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发表的。所谓重大历史关头,从直接的现象来说,是国际国内出现严重政治风波。从深层次来说,就是中国当时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也正处在第三个周期的下滑过程当中。就是说,改革遇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复杂问题,暂时还没有明确的回答,方向不明,道路不清,社会上的人们试图作出各种选择,思想非常活跃,也非常混乱。于是改革处在了一种犹豫、徘徊的状态。中国当时的政治风波,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但是,与苏联东欧不同并且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在改革第三周期结束的关键时刻,并没有向资本主义方向演变,而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采取了经济上治理整顿、政治上保持稳定的方针,首先稳住自己的阵脚,因而避免了苏联东欧各国那种动荡和剧变的前途。

记者:这就是邓小平的英明之处。

李忠杰: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由于社会主义改革存在着周期性发展的规律,所以改革在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的飞跃时期以后,客观上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消化、整顿、调整、巩固的过程。所以,从主观决策上来说,在政治风波结束以后,利用一段时间对改革的措施、成果进行治理、整顿,这是必要的。它有利于巩固改革的成果,也有利于我们更加冷静地总结改革的经验教训,思考“改革向何处去”的答案。

当然,采取这种方针,决不意味着放弃改革开放。面对困难和曲折,决不能对改革的必要性发生怀疑、动摇,更不能一有困难就回头路。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改革,社会主义才有出路,才能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开辟光明的前景。反之,如果在困难面前放弃改革开放的方针,那么,人们的思想必然会重新被禁锢,社会生产力将被压抑,繁荣活跃的经济活力会被窒息,生动活跃的政治局面又会变得死气沉沉,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会被堵塞,社会主义将重新陷入旧思想、旧体制的束

缚之中,甚至最终被人民抛弃。所以,无论在任何困难的条件下,我们都不能动摇改革开放的决心。

社会主义改革的周期性发展规律,既告诉我们改革出现困难和曲折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又告诉我们要善于驾驭这个规律,因势利导,不断地推动改革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当改革遇到困难时,要及时变更节奏,稳住阵脚,寻找新的出路。当环境和条件变得有利时,又要及时抓住机遇,部署力量,采取措施,掀起新一轮改革的高潮,将改革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邓小平的英明之处,不仅在于在紧急关头能够作出重大决策,保持国家的稳定;而且在于能够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在渡过了短暂的整顿、思索、调整期后,又及时地抓住机遇,作出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使我们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记者:这就是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的背景和深层次原因?

李忠杰:是的。正是在面对国际国内复杂局面,经过几年努力,基本稳住阵脚的情况下;正是在新的内外条件已经具备,人们对改革的要求再度高涨的情况下;正是在经过冷静反思,对社会主义本质有了新的认识,对未来自前道路更加明确的情况下,邓小平在1992年春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使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邓小平的重要谈话,不仅强调了改革开放不能变,审时度势作出了加快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而且对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进行了精辟的阐述,实际上回答了80年代末、也即第三个周期末我们所遇到的一系列难题,从而进一步指明了我们前进的方向。

总起来,回答了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怎样深入改革开放的问题。

第一,在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上,明确表示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第二,在要不要坚持改革的问题上,明确表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点,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第三,在改革政策的价值取向上,明确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用以衡量

和决定改革的方向和政策。

第四,在改革如何突破的问题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解决了改革开放中的一个核心难题,指明了改革开放取得新突破、走向新阶段的关键。

第五,在党的工作布局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关键是发展经济,同时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第六,在时机选择上,指出要抓住国际国内的机遇和条件,争取上一个新台阶。

所有这些,都是当时中国、也是整个社会主义改革进程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邓小平因势利导,科学地回答了这些问题,不仅加强了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的动力,而且指明了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所以,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南方谈话也就成为一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记者:从整个社会主义改革的进程来说,我们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周期?

李忠杰:是的。1992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出现了新一轮高潮。完全可以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及随后的十四大,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上,标志着第三个周期的完全结束和第四个周期的开始。当然,发生剧变的国家,已经超出了社会主义的范围,不再归结在我们所说的改革周期之内。但中国,无疑是新的阶段改革潮流的主体力量。整个90年代,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迈出了新的步伐,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展示了光明的前景。目前,我们正处在第四个周期的进行过程中。特别是中国刚刚加入WTO,这将给予中国改革开放以新的推动力。虽然,今后的改革开放还可能遇到这样那样的曲折和困难,还可能出现涨潮和落潮的变化,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被访者简介:

李忠杰(1952-),男(汉族),江苏丹阳人,中共中央党校校委委员,科研部主任,博士生导师,北京市,100091。

责任编辑 安平